

鬼子强奸妈妈,竟拿着刺刀逼爸爸旁观

1937年,黑色的记忆。

那年,侵华日军开着坦克、扛着枪炮、拿着刺刀,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6个星期中,数以万计的妇女被强暴,30万同胞成了冤魂……

幸存者李素芬,回忆起尘封70年的惨事,依旧有着难以启齿的屈辱与伤痛:妈妈被鬼子强奸,丧心病狂的鬼子竟用刺刀逼着爸爸在旁边看,两人都疯了,不久相继去世,更伤心的是,10岁的小妹妹在难民区也没幸免,被鬼子糟蹋后也死了,从此李素芬就成为孤儿,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逃到了江宁农村,才侥幸躲过了一劫。“以前所有的痛苦都深埋在心里,觉得丢人,不好讲……现在想通了,家仇国恨,不能不说,我要诉说我的经历,告诉全世界一个历史的真相。”

■链接

快报近期报道的大屠杀幸存者

杨翠英 83岁

大屠杀那年,杨翠英13岁。为了躲日本人,一家人搬进了大方巷一带的难民区,没想到,有一天,日本人冲进来,看见男的就抓。杨翠英的爸爸、舅舅、堂爷爷和被抓的几千人,被日军集中到大方巷后面的一个池塘边集体屠杀。杨翠英则被一个日本兵打聋了左耳。爸爸死后第五天,杨翠英的小弟出生了,可没多久,这个小生命也被日本兵活活踩死了。

陈秀华 80岁

70年前,在日军的追杀中,10岁的陈秀华和母亲被子弹击中,陈秀华左手和臀部受伤,母亲则倒在血泊中,再也没起来。10年之后,陈秀华左手手中的弹片才掉了出来。

张慧霞 79岁

1937年12月13日,9岁的张慧霞和爸爸吃过午饭坐在院子的长凳上晒太阳,叔叔倚着门框。这时,一对日本兵冲了进来,乱七八糟说了一通后,就用刺刀对准两个大人,把他们押走了。爸爸、叔叔从此再也没回来,加上失踪的大伯,张慧霞的奶奶一下失去了3个儿子。她曾带着张慧霞发疯一样在城里找尸体,可一具也没找到。

孙学兰 73岁

3岁时,被日本兵用火钳捣瞎左眼。8岁时,在放学路上,被日本军车撞倒,轧坏右腿现在已完全变形。

2002年12月,孙学兰去了日本13天作了7场报告,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日本人。



大屠杀幸存者李素芬 快报记者 顾炜 摄

鬼子到处纵火烧房, 婶婶被打死了

“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日本鬼子太坏啊。”昨天,84岁的李素芬老人回忆起70年前的情景,显得悲愤。“日本鬼子进城后看到人就杀,还到处放火烧房子。那时,我们住在新桥,鬼子很快就闯到新桥一带。”

李素芬老人告诉记者,1937年时她家住在南京城南新桥船板巷20号,和堂叔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房子是长形的,中间隔开,堂叔家在前面,李素芬家则在后间。“鬼子来了,”在惶恐的叫声中,熊熊大火燃烧起来,“那时,所有的房子都是相连的,一间接着一间,转眼就成了灰烬,我们家当时经商,卖丝巾,家境还不错,我爸妈把家里所有的棉被、棉衣拿出来泡水,然后放在床上或其他地方,火烧到我们家时,没有烧起来,家保住了。”李素芬双颊痛苦地抽搐了一下,“鬼子到处放火,还到处抓人。我婶婶在家就被他们拖出去了,我叔叔出去找她,跑到新桥时,也被鬼子逮住,押到一个地方,与10几名中国人一起绑在那,鬼子正准备用机枪扫射时,正好另一个鬼子跑来,说‘快走,有事呢!’这样,使得这10几个人逃了出来,他们互相帮忙,解开了绳子,跑了。叔叔回到家时,就发现婶婶躺在家门口的一个

米店旁,腰上被打了一枪,汨汨地冒着鲜血,抬回家不久就死了。”

鬼子当着父亲的面强奸母亲

放火烧房的第二天,鬼子又来了,闯进了李素芬家,那时年幼的妹妹跟着养母去了难民区。

“我吓得躲在被子里,妈妈说‘小孩,小孩’,我妈年轻时非常漂亮,小鬼子就开始糟蹋我妈,我爸上前要阻止,旁边的鬼子就拿刺刀对着他,强迫我爸看着。我爸爸当时就得了精神病,我妈被糟蹋后精神也出了问题,整天哭着喊着闹着,嘴里叽里咕噜的……没过几个月,他们俩就都死了。”

由于在家实在不安全,一天夜里,李素芬和叔叔家的堂妹就一起结伴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收容所去找她的养母,她们把头发剃得短短的,穿了男孩子的衣服,脸上抹着黑黑的、厚厚的锅灰,“鬼子到处找花姑娘啊,这样就安全多了……我们后来找到了养母和小口,才知道我的小口被日军强奸了,她当时只有10岁,丧尽天良的日军连一个10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老人有点哽咽,“吐浓痰,咳血,可怜的小妹回到家,就变了,什么也不说,几个月后也随爸妈去了。”

从此,李素芬成为一个孤儿。

“我告诉日本人,铁的事实不能抹杀”

70年过去了,老人把巨大的痛苦一直深埋在心里,保持着乐观,享受着新生活的幸福。

昨天,记者见到她时,一身大红的呢子上衣,脖子上扎根彩色丝巾,耳朵上还戴着两个大大的银色耳钉,看上去精神矍铄,“我听力好,眼睛也好,还能看电视,就是没有文化。”老人长长地叹了口气,她告诉记者,因为不怎么识字,也找不着什么好工作,一直靠帮人缝补衣服,历经千辛万苦,才存活下来,现在年纪大了,非常喜欢这种平静的生活,“每天我都要打5套太极拳,玩玩棍子……所以才身子骨硬朗。”不过,老人表示,她从没有一天忘记过那段惨绝人寰的往事,“去年日本人来采访我,我还告诉他们,不管怎样,你们不能赖,铁的事实是不能抹杀的。我还带他们,还有美国人去看了当年的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收容所,12人一间房,虽然有美国人华小姐(即魏特琳)的庇护,但小鬼子还是经常来抓花姑娘……他们都说我说得好,日本人也说我说得对。”老人脸上浮现出一丝欣慰,“苦难我们这一代人受了,下一代人一定要珍惜和平与幸福,一定要记住历史的真相。”

快报记者 毛丽萍

幸存者名录:还原浩劫中每个鲜活的生命

今年8月13日,收录了2592个幸存者资料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在南京出版。

抽象的数字被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名字,一个更为鲜活的历史慢慢显露了出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70年来,首次在国内以“名录类”形式出版的图书,填补了历史文献与研究的空白。它以幸存者等历史证人的个性化史料,进一步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对从事史学研究来说,是一套翔实、丰富的史料工具书;对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说,则是简明易懂的历史教材。不过,他强调,名单收集工作非常艰难,目前才刚刚开始,这项工作将持续进行。

国外纪念馆给了启发

令朱成山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参观。

2004年,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人们可以从中查到300万左右遇难者的姓名和个人资料。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上仅镌刻着3000个遇难者的名字。这个巨大的反差刺激着朱成山的神经: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馆要进行第三次扩建。新馆建成后,展厅面积将从原来的900平方米,扩大到6000平方米。这么大的展厅,展览什么?怎样才能帮助人们找回对那段历史的情感记忆?

朱成山想到了参观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那

个装满遇难者档案盒子的展厅。“那个展厅里,档案盒从上到下装满了整面墙壁。每个可以搜集到的遇难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档案盒。盒子上写着他的名字,里面装着属于他的资料,不但有年龄、职业、家庭,甚至还有生前的爱好。”

如果,能找到那些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把他们编成《名录》,输入“数据库”,再制成档案盒,那将给人们一种全新的了解历史的方式。

200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的编辑工作开始了。

历史上曾有过四次大规模调查

由于那时候,管逃难叫‘跑反’。比如家原本在安徽乡下,鬼子来的时候听说南京城里安全,就跑到南京。到南京以后,又听说乡下安全,又跑到乡下去了。这种毫无规律的人口流动,加上连年战乱,户籍制度不完善,使得编辑者们不可能根据户籍查找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姓名。

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民国史处于历史研究的禁区,而作为民国史一部分的南京大屠杀,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事件发生以后,南京学界才重新开始面对这段历史。因此几乎所有研究者在谈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时,都惋惜地说,我们动手太晚了。

而事实上,朱成山介绍,1938年、1951年、1984年、1997年,历史上对遇难者和

幸存者曾进行过四次大规模调查,形成了一些名录。199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动了14700多人进行调查,这些人主要是高校和高中学生,其中包括26名来自日本的大学生。他们经过专门培训后,在40天内对南京市15个区县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调查,回收有效结果1213份。只是调查的结果却令江东门纪念馆非常失望,一些中学生的报告五成以上非常粗糙,对一件事的叙述不完整,时空观念混乱,有的连幸存者的年龄、受害地点、受害方式都没有,“只是含糊地说,死了。调查中几个重要的时间、地点信息不详,就无法使用,而且字迹潦草,他、她不分,给身份的确认造成了难度。”

不过,近年来,南京学者倒是从海外搜集到了大量证据。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十九集《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主编郭必强研究员告诉记者:“搜集遇难者和幸存者姓名,是南京许多高校、科研机构及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的工作。2004年,南京大学组织了一批专家专程赴台北查阅档案,当时搜集的遇难者姓名就有数千个。今年再赴台湾时,又发现了数百个遇难者姓名。”

20多人埋在史料里一年多,没日没夜

据了解,在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录入的过程中,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专门成立了两个工作小组,开展“历史证人个性化档案”的建档工作。迄今为止,此项工作已开展了一年半。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 资料图片

“20多位年轻人,埋在史料里一年多,没日没夜。”朱成山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从4000多份名单中确定了2592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从9000多份名录论证为8284个。其中,老人1510人,妇女1370人,儿童262人。”

做完第一天的录入工作后,25岁的东北女孩颜玉凡当晚就失眠了。她给自己的硕士生导师朱成山发了这样一条短信:“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受害者的信息,满脑子都是日本人的凶残。这是我做过的最有价值的事。”

“搜集、整理、筛选、录入、研究、编撰、出版,每一步都不能掉以轻心。”朱成山介绍说,由于当时记录人所处的时代、口音、文化程度不同,名录中不乏错误。例如,有的将人名里的“浦”写成“蒲”,实际上是同一人。还有由于资料的重复性,竟然发现了13个

李秀英。后经调查核实,最后确定其中确实有4个叫李秀英的遇难者或幸存者。

对于时间和地域,也进行了详细考证。例如,将当年和现在均不属于南京市的句容、仪征、马鞍山、滁州等地,现在属于南京市范围而当年不属于南京市的高淳县,全部从名录中删除;将1937年8月15日—12月5日日军飞机轰炸南京时被炸死的遇难者或幸存者,1937年12月1日—12月12日日军侵占南京时的遇难同胞或幸存者,作为两个附录。

“我们不能忘记,每一条名录下面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要记住他们。”朱成山强调,“名单搜集工作才刚刚开始,此次公布的幸存者的名录是专家研究的首批成果,不管这项工作有多难,名录的搜集工作将持续进行。”

快报记者 毛丽萍